

端牢中国饭碗不惧极端天气

极端天气已成为影响粮食安全的最大变量之一。今年我国先后遭遇局部地区干旱和区域性洪涝双重考验,粮食生产面临较为严峻挑战。目前,夏粮生产克服局部较重旱情影响,实现稳产丰收,而夺取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还需闯过多道关口。应继续做好农业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加强重大病虫害防控,不断增强农业气候韧性。

深入实施藏粮于地战略,通过建设高标准农田、加强水利基础设施建设等措施,为粮食防灾减灾救灾提供基础性保障。稳步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大力开展农田沟渠修复整治,建成超过10亿亩高标准农田,早能浇、涝能排,确保早涝保收。加强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建设,通过推进灌区现代化改造、完善抗旱排涝体系、推广智慧灌溉技术,让每立方米水都能精准润泽良田。提升耕地质量,在干旱或半干旱地区推广保护性耕作,通过秸秆覆盖、免耕播种等技术,减少土壤水分蒸发,提高降水利用率,增强土壤保墒能力。适应气候变化,优化种植结构,在干旱半干旱地区重点推广耐旱作物;在低洼易涝区推广耐涝作物,或者发展“稻渔共作”“稻虾共作”“稻蟹共作”等生态种养模式,降低粮食减产风险。

深入实施藏粮于技战略,让农业科技

面向未来,应以系统性思维构建全方位多层次农业防灾减灾救灾体系,确保中国饭碗在极端天气来袭时端得更牢更稳,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成为抵御极端天气的坚固盾牌。经过多年努力,我国农业科技贡献率突破63%,农作物综合机械化率超过75%,农业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进一步增强。培育推广耐旱水稻、抗涝玉米等抗逆新品种,使农作物在恶劣气候下仍能保持较高产量。智慧农业为每寸土地精准“把脉”,卫星遥感、物联网、大数据等技术帮助农民实时监测土壤墒情、病虫害,提前预警极端天气,优化田间管理。智能农机让田间作业更加精准高效,提高作业效率,降低了天气不确定性带来的不利影响。还应紧盯大面积单产提升关键措施的落实,提高先进适用技术覆盖面和到位率,促进粮油作物大面积均衡增产。

农业保险为种粮农民撑起“保护伞”,避免因灾返贫。天有不测风云,一场洪涝或干旱可能让种粮农户的辛勤耕耘化为乌有。农业保险是分散农业风险、保障农民收入稳定的重要工具。稻谷、小麦和玉米三大粮食作

物完全成本保险和种植收入保险已在全国铺开。完全成本保险的保险责任涵盖当地自然灾害、重大病虫鼠害、意外事故、野生动物毁损等风险,种植收入保险的保险责任涵盖农产品价格、产量波动导致的收入损失。与传统物化成本保险相比,这两个险种保险责任范围广,保障水平最高可达相应品种种植收入的80%。受灾农户通过理赔资金,一定程度上可以弥补种子、农药、化肥、农机投入等生产成本。尽管农业保险作用显著,但在实际推广中仍存在定损难度大、拖欠补贴等痛点。承保机构应优化险种设计和理赔服务,确保一旦出险能够快速理赔、应赔尽赔,切实增强农民获得感。

极端天气易导致区域性、阶段性粮食供需失衡,引发粮食市场异常波动。我国逐步建立起以政府储备为主、企业社会责任储备为辅、城乡居民家庭存粮为补充的储备体系,为应对突发事件、市场保供稳价筑

牢安全防线。企业根据市场预期和经营需求增加库存,与政府储备形成互补,在自然灾害或物流受阻情况下,企业可以就近调配库存,缩短应急响应时间,提高粮食供应的灵活性和可靠性。城乡居民家庭存粮,能起到“缓冲阀”作用,为粮食应急供应争取时间。我国已建立覆盖储运、加工、配送、供应等各个环节的粮食应急保障体系,在抗击自然灾害、应对疫情冲击等重大挑战中展现出强大韧性。

风雨淬炼,方显韧性;未雨绸缪,筑牢根基。面向未来,应以系统性思维构建全方位多层次农业防灾减灾救灾体系,确保中国饭碗在极端天气来袭时端得更牢更稳,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邹晓梅

陈大鹏

净化直播生态走向价值耕耘

雷雨田

近期,关于网络直播内容低俗的报道层出不穷,擦边团播、低俗斗狠……这一老生常谈的问题再度成为关注焦点。

网络直播根植于虚拟世界的数字沃土中,技术赋权带来的话语权下沉,令其在诞生之初便被深深植入“强娱乐性”“强交互性”“强传播性”等基因,受到网友的喜爱和追捧。网络直播业态突飞猛进的发展态势,也更赤裸、更直观地暴露出其所暗藏的低俗文化与价值观危机。

近年来,职能部门持续完善法律法规,升级治理体系,密集部署“清朗·整治短视频领域低俗营销乱象”专项行动、“清朗·2025年暑期未成年人网络环境整治”专项行动等,网络空间风气焕然一新。

然而,低俗直播仍屡禁不止。究其根源,既有“流量为王”价值观的误导,也有网络黑色产业链的推波助澜。当擦边团播与低俗斗狠屡屡冲上热搜,当“萝卜快了不洗泥”成为行业隐痛,网络直播的治理困局暴露出更深层的命题:净化生态不能仅靠监管利剑,更需要平台企业与网络主播从被动合规转向主动共治。

构建风清气朗的网络空间,破解“整治—反弹—再整治”的循环困局,需要社会各界形成合力,这既离不开职能部门的长期作为、综合施策,也离不开广大用户的积极参与。作为

网络直播业态的重要参与者、实践者,平台企业和网络主播应压实主体责任,更新经营理念,打破低俗路径依赖,形成“以人为本”“流量向善”的行业发展共识。

对平台企业来说,不能止步于做“内容守门人”,更应成为“生态设计师”。加强技术研发,提升AI审核识别能力,是平台治理低俗内容、净化网络生态的现实选择,应积极突破审核技术瓶颈,强化AI的语义识别、行为预判能力,推动审核系统从“关键词拦截”向“多模态理解”跃迁。优化算法推荐也是有效举措之一,平台企业应重塑流量分配机制,给予内容质量更高的分配权重,通过有力引导让低俗直播失去生存空间。

对网络主播来说,放弃低俗绝非断腕之痛,而是破茧重生之机,应清醒认识到,低俗流量实为“毒糖果”,专业内容才是“硬通货”,应始终不停推进内容创新、深挖内容价值,用专业壁垒取代擦边噱头,以专业素养重塑职业尊严。

治理低俗直播的本质,是推动网络直播行业从“流量狩猎”走向价值耕耘。当平台用算法点亮优质内容,当主播用专业赢得用户尊敬,网络直播才能释放连接千行百业的澎湃动能。



勾建山作(新华社发)

文商旅融合焕新乡村场景 育儿补贴体现“投资于人”的长远考量

文化和旅游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全国乡村旅游接待总人次7.07亿,同比增长8.9%;总收入4120亿元,同比增长5.6%。增势背后,是农业、文化、旅游深度融合带来的变化。农文旅深度融合正成为连接“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的重要转化通道,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注入强劲发展动能。

多年来,我国农文旅融合发展呈现量质齐升态势。我国目前已建成1597个国家级乡村旅游重点村镇,超6万个行政村开展乡村旅游经营活动;全国15个乡村入选联合国旅游组织“最佳旅游乡村”,数量居全球首位。上海市建成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点位874个,2024年接待游客2532.46万人次,实现营业收入29.31亿元,形成桃花节、菜花节等特色IP;甘肃省的迭部扎尕那村,完整紧密、自给自足、半农半牧、优势互补的农林牧复合系统,被联合国粮农组织认定为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

政策体系的持续完善为农文旅融合发展提供了坚实支撑。2024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加快构建粮经饲统筹、农林牧渔并举、产加销贯通、农文旅融合的现代乡村产业体系。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要求,推进乡村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开展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试点。不过,一些问题依旧不容忽视:项目同质化导致约30%乡村旅游项目陷入“一次性消费”困境,专业运营人才短缺制约服务质量提升,土地、资金等要素保障不足,技术创新应用不充分,文化资源转化深度不足,等等。为此,要从科技、文化、人才等方面施策。

融合新业态。深化“互联网+文旅”融合,支持直播电商、VR云游等新业态。建设县城文旅大数据平台,整合生产、客流、消费数据,为项目规划、营销推广提供决策支持。通过智能化改造,将传统农耕资源转化为可感知、可交互的数字资产,实现“农田变课堂、农房变展厅、农产品变潮品”的价值跃升。

深耕文化IP,培育特色融合品牌。通过文化解码、场景再造、价值共生,使每个乡村都能找到“精神坐标”。可借鉴泸溪县“以水兴旅”战略,以村舟为媒将非遗展演与体育赛事融合,吸引线下游客与线上观众达108万人次,带动餐饮、住宿、文创等消费1.7亿元。实施“一村一韵”培育计划,以差异化激活全域资源,如甘肃省“十四五”期间建设了30个乡村旅游示范点、300个文旅振兴乡村样板村,培育530个乡村旅游合作社,形成元古堆村“七大产业联动”、毛寺村“黄土窑洞民宿”等特色模式。推动非遗活态传承,支持绣娘、匠人开发在地化文创产品,实现“让文化可体验、让技艺可增收”。

精心培养人才,打造乡村运营主力军。例如,浙江某学校设立的“乡村运营与创新创业”微专业入选教育部“双千”计划首批入库名单,与农创客联合会、乡村运营企业及乡镇深度合作,实施“校政企村”联动培养,首批68名毕业生就业率达100%。还应孵化草根精英,让本土人才成为中坚力量,如陕西丹凤县建立专家工作站,引进56名专家,帮带培育科技型中小企业114家,解决技术难题30项,转化成果12项。

近日,国家育儿补贴制度实施方案公布,从2025年1月1日起,无论一孩、二孩、三孩,每年均可领取3600元补贴,直至年满3周岁。近年来,我国出台了一系列生育支持政策,从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到发展普惠托育服务,受到育儿家庭欢迎。此次育儿补贴政策面向育儿家庭全国范围直接发放现金补贴,将助力降低家庭生育养育成本,预计每年惠及2000多万个婴幼儿家庭,体现了“投资于人”的长远考量。接下来,可在补贴基础标准上,建立与地区物价指数联动的动态调整机制,确保补贴实际购买力不缩水。简化非户籍常住人口申领流程,通过政务平台数据共享实现“无感申领”,扩大政策覆盖面。探索“补贴+服务”组合模式,将现金补贴与社区托育券、儿科诊疗优惠等配套服务绑定,提升政策综合效益。(时 锋)

开拓工业智能化转型广阔空间

程 晴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规模以上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9.9%,智能设备制造、电子元器件及设备制造等行业实现两位数增长,增速分别为14.9%、11.7%。当前,人工智能技术正在推动制造业生产方式和发展模式深刻变革,在工业高质量发展中的作用日益凸显,成为我国从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迈进的关键引擎。

多年来,伴随对人工智能技术的持续探索,我国工业智能化建设取得重大成就,正在加快我国工业高质量发展的步伐。2024年,我国在新型储能、人形机器人、具身智能机器人等领域突破关键共性技术672项,实现技术成果转化690项,孵化企业182家。在“科技产业金融一体化”专项推动下,有效期内的高新技术企业总数已达46.3万家,规模以上工业高新技术企业达到16.9万家。一些地方的工业智能化探索效果显著。例如,江苏省通过“智改数转网联”三年行动,为全省6万余家企业提供免费分析,推动728个智改数转网联重点项目建设;广东省以新质生产力重塑传统产业,实施消费品工业“数字三品”行动,推动30多个细分传统行业加快数字化改造。多年来,一系列国家战略规划与政策文件为

工业智能化发展提供方向指引与根本遵循。2021年工信部印发的《“十四五”智能制造发展规划》提出,到2025年,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大部分实现数字化网络化,重点行业骨干企业初步应用智能化。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6部门联合启动的2025年度智能工厂梯度培育行动,将智能工厂的培育划分为基础级、先进级、卓越级和领航级4个梯度,通过分层培育推动智能制造普及深化。

在发展过程中,也暴露出一些问题:工业智能化转型的产业基础还不够扎实;产业生态仍需提升,部分中小企业面临“不敢转”“不会转”的困境;工业智能化转型标准和安全意识仍需进一步加强,这些都制约了工业智能化的全面普及,亟待系统性施策。

夯实产业基础。加速基础设施建设和升级,拓宽工业智能化转型的广度和多元融合的深度,使设施能够适应更复杂的工业场景,为工业转型提供强劲动力。推动专用大模型构建,在普遍、广泛使用通用大模型的基础上,要针对不同行业的特点和需求,开发行业专用大模型,以便更精准地解决生产实践中的具体问题,应对工业发展的复杂挑战。建立高质量行业数据集,更好、更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月份至6月份,我国在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非金融类直接投资同比增长22%,高出整体对外投资21.4个百分点;按人民币计价的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同比增长0.6%,在去年同期较高基数基础上,继续实现温和增长。在全球跨境直接投资态势疲软的背景下,我国境外投资保持增长态势,为国际产业和投资合作增加了稳定性和新动能。

一直以来,我国境外投资加快转型,实现了量的稳定增长和质的稳步提升,在推动我国企业融入国际创新体系和全球价值链网络,促进国内国际经济高效联动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我国已成为境外投资大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存量均连续多年居全球前三位。国际投资头寸表显示,2024年末,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资产达到3.1万亿美元,占我国对外资产的比重从2010年的8.2%增长至30.7%,提升22.5个百分点,对外资产结构进一步优化。对外直接投资地区布局更加多元,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投资合作持续走深走实,对东盟、拉美等地区的投资为我国有效应对经贸摩擦等不利冲击提供了重要支撑。我国更加注重风险防范与可持续发展,企业境外投资更趋理性。房地产、酒店等资本密集型境外收购显著降低,技术驱动型、市场导向型对外投资稳定增长。对外直接投资中绿地投资占比超过80%,更多投向先进制造业、绿色能源和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对外投资新模式、新业态不断涌现。此外,本土化经营水平显著提升,与东道国实现互利共赢。对外投资有效带动了我国企业进出口增长、助力国内产业转型升级,也对东道国工业化城镇化以及就业、税收作出突出贡献。数据显示,2023年,中资企业向投资所在国缴纳各种税金753亿美元,雇佣员工中近六成均为外方员工,达257万人。

要认识到,我国企业的国际化发展并非“一帆风顺”,未来也必须做好迎接风浪考验的充分准备。从外部环境看,外商投资安全审查等限制性政策增多,部分经济体泛化“国家安全”概念,限制中资企业在当地合理投资经营;部分发展中经济体营商环境不佳,政策稳定性连续性有限,有的国家甚至出现经济和社会动荡,影响中资企业资产和人员安全。从中资企业自身看,部分企业国际化经营能力不足,国际化人才队伍建设存在短板,合规意识和合规管理尚有薄弱环节。另外,中资专业服务机构对企业“走出去”的支撑作用有待增强,境外投资管理和相关制度有待健全。提升境外投资质量与水平,要统筹推动“加强国际合作+优化机制体系+做强微观主体”,不断形成发展合力。

国际合作层面,探索与更多经贸合作伙伴商签或升级现有的双边投资保护协定、双边税收协定等,推动落实世界贸易组织通过的《促进发展的投资便利化协定》,为中资企业国际化发展争取更好的营商环境。

国内机制层面,持续优化企业境外投资管理服务制度体系。完善境外投资管理制度,立足企业“走出去”全生命周期,加强跨部门、跨地区信息共享和政策协调,健全事前事中事后监管体系。优化境外投资综合服务体系,支持本土财务顾问、咨询评估、法律、会计、信用评级等机构国际化发展,支持商协会提升为企业提供国际化经营服务的能力,更好发挥中国企业“走出去”综合服务基地等平台作用。

企业层面,立足自身优势、着眼发展大势,主动提升国际化经营能力。创新国际化发展模式,灵活采用“产品出口+当地物流和营销网络”“零部件出口+境外组装”“境外配套+生产基地”以及联合研发、特许经营、第三方市场合作、共建产业园区等模式,优化全球资源配置、开拓多元化海外市场。加强国际化经营合规体系建设,遵守所在国法律法规和国际通行规则,履行必要的社会责任,树立中国投资者良好形象,加强风险预警防范和海外利益保护。

(作者分别系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投资研究所副研究员、对外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